

HONGJUNHJNXILIECONGSHU
HONGJUNBEISHANG

红军魂系列丛书

红军

北上

窦嘉绪·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CHINA WORKER PUBLISHING HOUSE

LT0000224480R



I247.51
20

红军魂系列丛书

HONGJUNHUNXILECONGSHU

HONGJUNBEISHANG

红军北上

窦嘉绪·著



PDF

红军北上

窦嘉绪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15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

ISBN 7-5378-1929-7
I·1868 定价:19.00元

第 章

1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贵州遵义。

就在这3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红军司令部的会议室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检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检讨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尽力统一认识，并在组织上采取相应措施。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正中坐着博古、毛泽东、周恩来、

在历时3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其他与会者是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李德3天来一直坐在门边，为他翻译的伍修权也只得挨他坐着。李德尴尬的座位似乎表示他处在一个被告的地位。

这不是一般的会议，这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及至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也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党和红军中的一些领导者的地位，也会在会中发生变化。所以，有人以沉重的心情，回顾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今后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有人以沉重的心情考虑别人的错误以及自己的责任；有人却以沉重的心情考虑如何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或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但多数人则以沉重的心情考虑在这一场较量中支持谁反对谁。会议上呈现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人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

会议由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总结的报告》。他虽然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但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到了客观原因上去，“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归咎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的斗争配合不够，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承认主要是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博古的报告显然没有赢得与会多数的同情，人们纷纷议论，说他不实事求是，企图推卸责任。

继博古报告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从主观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

要因素。并联系自己诚恳的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自我批评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报告后,洛甫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洛甫及毛王的提纲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

接着,毛泽东手里拿着一份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的稿子,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着重批评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并侧重批评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毛泽东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方向。他批评博古、李德时,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战术,反驳了博古在报告中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毛泽东坚持认为是军事路线错误。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路主义”。

毛泽东发言中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的。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军队防线背后,从后面打击敌人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但却深深地刺痛了博古、李德和他们的个别支持者。

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他完全同意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对今后行动的论述，完全同意对博古、李德的批评，要求博古让位，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所以，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朱德在会议上，以尖锐的语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作了很有分量的发言。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临时中央了。”他在发言中还表示，他自己和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他同周恩来、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是很浓厚的。他作这样的发言也不是偶然的。第一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到罗霄山脉中段同毛泽东一起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是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有朱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这次会议上更是如此。

但是，主持会议的博古却坚持错误，只承认在苏区工作和红军领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的路线错误。列席会议的李德坚持错误，态度十分顽固，他在几句简短的发言中依然认为博古是正确的，竭力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辩护，并为自己开脱。

会上，多数人在发言中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再次发言中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并说：毛泽东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周恩来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陈云当时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

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议中，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这个月的月底，当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强调说：“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显然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意毛泽东出来领导已成为会议上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呼声，只有博古和凯丰表示反对。凯丰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凯丰的狂妄态度受到了与会多数的批评。奇怪的是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过一句言，是因为他积极支持过李德的“短促突击”而感到难堪呢，还是心中另存有什么打算呢！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委托洛甫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及长征初期推行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与其所造成的严重损失，重新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并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人。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

导，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中的擎天支柱就是毛泽东。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因为它使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摆脱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长达4年之久的危害，也摆脱了受制于外来干预的被动地位。

太阳悬挂在遵义的上空。多么美丽的太阳啊！在雨后的晴空里，显得多么清新、温暖和明亮。当红光满天的曙光与遵义会议放射出来的金色溶为一体的时候，天空中便永远高悬着另一轮不落的太阳。这轮红日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将驱除蛮横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妖魔鬼怪，使黑暗的中国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2 这些天，天气也真的格外地好转，阴雨不见了，太阳一直红艳艳地照着。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使人兴奋，也使人陶醉。特别是那些经过了长途跋涉，由江西瑞金出发，几经鏖战，大难不死，日夜穿行在山间、阴霾雾霭中的红军指战员们，更深深地感到，这温暖的阳光，这金色的太阳，冲破了黑色的幕帷，撕破了乌云，驱散

浓雾的遮拦，终于在晴朗的天空中光辉灿烂地出现了，使每一种东西都明亮了，闪光了，也使红军指战员的心明亮了，闪光了，舒畅了。领导他们打了那么多胜仗的毛泽东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了，这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红军指战员们不禁想起了长征开始以来，一路上眼巴巴地盼望着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红军在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在这之前，大家常常翻来覆去地在想：现在向哪里去？又干什么？到底在哪里开辟新根据地呢！天天行军，天天动员，磨破嘴皮一句话：坚决跟着党走，一定有前途。现在好了，有毛主席出来领导，为他们指引方向，带领他们向着胜利，向着光明走去。方向和任务明确了，心中有数了，大家都信心百倍，情绪非常高涨，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毛泽东、周恩来与党中央领导机关1月20日翻越娄山关到桐梓。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军委发出了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计划决定改变战术，“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兵力（约一团左右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或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党中央一行，经松坎向西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

州上游渡江”。指示红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敌人，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可是，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使红四方面军不向南靠拢，反而北攻陕南，以致敌人重兵很快就要集结长江南岸，全力阻击红军北上，而且后面追兵将至。形势又变得十分严峻。

在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人仔细地研究着红军的行动方向。

毛泽东虽然神色沉重，但声音十分自信，他说：“我军突破了蒋军的包围，进军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红军肯定会从此走向胜利。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仍然会有许多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分析当前形势，正确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恩来，你把蒋军的动向向大家说上一遍。”

自从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与他一起负责军事，周恩来自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信心充满心间。在宁都会议上他就曾经说过：“泽东多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他可提出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对“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挤十分不满，发表了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被“左”倾机会主义否决，不但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政委，而且还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解除，使红军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当中央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毛泽东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葬送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提出了挽救中央红军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黎平转兵，进军遵义。事实又一次证明，毛泽东不愧是我党我军的英明领袖，周恩来决心辅佐毛泽东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时刻都要协助毛泽东搞好红军的每一步军事行动，当然对眼前的敌情就十分关注。所以，当毛泽东要他将敌人的动向向大家说上一遍的时

候，他就对在座的人们详细地讲述了一遍从遵义会议期间到红军离开遵义以来敌人的活动情况，最后他说：“根据当前形势，我军必须迅速占领土城、赤水，从这一带相机渡江。只是张国焘没有执行中央命令，四方面军没有南下钳制敌人，使敌人的行动加快。只怕敌人会封锁长江，对我军围追堵截。到时如何对付这些来犯之敌，泽东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一定会指引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说：“我们是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敌人抢在我们前头封锁了长江，我还是那个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的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的敌人十分密切，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又接着说：“敌人一定会集结重兵封锁长江，妄想把长江变作第二个湘江。但是，长江之长他不可能处处严密封锁，这样，我们走更多的路就很有必要。机动灵活，随机应变，怕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内注定要多走路的，也是不能动摇的。噢，对于走路，我们红军指战员不会有多大的意见吧！”

朱德深有体会地说：“走路走出胜利，这对广大红军指战员来

说是坚信不疑的。他们跟着主席从井冈山走到瑞金，根据地越走越大。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走了那么多的路，他们都知道这是主席的战略战术，毫无怨言，指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取得了一连四次的反‘围剿’胜利。只是在我们高级指挥员中，我怕会有人节外生枝。”朱德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了。他说的怕会有人节外生枝，指的是林彪。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遵义，林彪发过多少次牢骚，只是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几次发泄牢骚，包括对毛泽东的不恭，毛泽东都原谅了他。毛泽东看到了林彪能打仗的一面，也就似乎一好遮百丑了。

毛泽东对朱德的话也有所感触，知道他话有所指。林彪的这些短处，毛泽东早已看到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同。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总是这样看待林彪。至于下一步林彪又会出现什么洋相，毛泽东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是一起支持毛泽东的。遵义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也有他的功劳。他从实际中得出对走路正确看法，支持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这使毛泽东十分满意。

红军又开始了紧张的徒步行军。红一军团由桐梓、松坎向西，红三军团经仁怀向北，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先夺取赤水县城，作为渡江的桥头堡，然后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

3

蒋介石这些天在南京官邸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的锦囊妙计，竟然全盘落空，这使他又羞又怒，又狂又哀。他真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和他作对，使他垂手可得的東西又突然化作泡影。湘江封锁已使中央红军伤亡残重，损失过半，眼看湘西防堵就会使中央红军全军覆没。他曾想只要中央红军全军覆没，共产党就会失去支柱，大厦将倾，剿共大业就会指日完成。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中央红军会在黎平转兵，不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反而进军黔北，突出了他的包围，将他布防下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湘西，使他一时手足无措。当他从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进驻贵阳的追剿红军的嫡系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处送来的情报中，得知了遵义会议，从此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也使他万分悲哀。自从共产党的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失去了兵权，他才取得了五次“围剿”的胜利，总以为消灭红军已胜券在握了。可现在毛泽东又掌握了兵权，这才是他的心腹大患。一种盲目的、不自觉的、野兽一般的狂怒开始在他心里激荡起来。他觉得快要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因而又不由得惊惶起来。他深深地认识到：任何上流人的涵养和基督徒的虔修的深处，都不免隐伏着某种潜势力，自我恐怖就强烈地笼罩着他。

突然，蒋介石用一种狂怒而又嘶哑的声音长呼一声道：“既生蒋，何生毛！”这声音震荡着，沿着拱形的屋顶渐渐消失，使得他自己充满了疯狂的恐惧，越发地把头低下去，一动也不动了。

宋美龄站在蒋介石的旁边，睁大眼睛注意自己的丈夫还会发出什么喊声来，可接着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宋美龄不知道这沉寂延续了多久，也许只是一刹那，也许过了无尽长的时间。突然一阵震动，使她恢复知觉了，她的嘴唇开始翁动，起先还听不出声音，慢慢

地，发出了一种蚊哼般的声音：“大令，你可不能萎靡不振啊！”

听到宋美龄的这一声劝告，蒋介石突然又抬起了头，发出了阴险而又奸诈地笑声，说：“萎靡不振！我蒋某什么时候萎靡不振过？我只是在思索如何对待目前的局面，也就是毛泽东重新掌握兵权以后的红军。”

当毛泽东重新掌握红军兵权的消息传来，宋美龄受到的震动并不亚于蒋介石，使她痴痴呆呆，忧心忡忡。现在听到蒋介石的这声英雄气概，宋美龄顿时也觉得轻松多了。他坐在蒋介石身边，柔声安慰道：“是的，大令英雄盖世，岂怕他个毛泽东。我们拥有中央，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只要大令运筹帷幄，定会将红军一举消灭。虽然我们失去了在湘西消灭红军的机会，但我们可以把长江变作第二个湘江，在长江沿岸布下天罗地网，料他红军插翅难逃。”

蒋介石精神一振，连连说：“好，好，把长江变作第二个湘江，正合吾意，正合吾意。只要再有一个湘江之战，红军就会所剩无几了。”

宋美龄说：“不是所剩无几，而是全军覆没。”

经过宋美龄的几声激励，蒋介石从哀叹和狂怒中恢复了平静，对宋美龄说：“夫人，你就安排一下，召开个会议，研究把长江变作第二个湘江事宜。噢，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还是南昌行营的智囊团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五次围剿和湘江布防的经验。”

自从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退出江西开始长征之后，蒋介石就把南昌行营中的主要谋士视为掌上明珠，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自己的高级参谋，研究消灭红军的会议，也就只有他们够格参加。

这些谋士虽然在江西五次“围剿”施展了“才能”，湘江布防也立下了“大功”，但在红军进军遵义后，他们也都自愧未向蒋介石参

谋到这一步，而无颜再见蒋介石，所以这些天来，一个个闭门不出。这次虽被蒋介石召来，心中担忧怕被问罪，也就垂头丧气，低头不语。尤其是陈诚更是羞愧难当。因为薛岳这个追剿红军的前敌总指挥是他亲自向蒋介石保举的，薛岳部队又一向归陈诚指挥。薛岳在追击红军时却没有穷追猛打，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以致红军顺利地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他只怕蒋介石追究起来，自己也罪不容赦。

蒋介石看到这些谋士们无精打采，心事重重，知道他们内心的忧虑。气可鼓而不可泄，今后的剿共大业，尤其是眼前的围堵红军，还是要靠他们出谋划策，便微微一笑，说：“诸位都是蒋某的股肱，是我的得力助手，这次把红军赶出江西，全赖诸位之力。薛修是五次围剿的主要指挥官，当然功劳最大。至于红军进占遵义，并非诸位出谋不当，而是黔军无能，特别是乌江防守作战不力。噢，是谁担任乌江防守的指挥官？”

陈诚毕恭毕敬地说：“是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

蒋介石说：“此人现在何处？”

陈诚说：“红军突破乌江以后，侯之担已逃往重庆。”

蒋介石大骂了一声，立即向宋美龄说：“传我口谕，守乌江的侯之担作战不力，令在重庆的驻川参谋团拘押查办。”

宋美龄答应一声，立即记录下来。

原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主管作战业务的晏道刚，对薛岳追击红军不力很有意见，这时也乘机向蒋介石进言道：“薛岳部在追堵途中，未与红军作过战，人都说他是‘送行’到贵阳。可人马实力沿途逃亡、疾病、落伍已减去大半，8个师的番号虽然依旧，兵力却剩下不及5万了，请委员长明查。”

原南昌行营参谋长兼第二厅厅长杨永泰也接着说：“红军占领遵义，薛岳进驻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虽然觉得自己在贵阳无立足之地，但意欲恢复黔北还是正确的。他认为黔北资源比较富裕，倘被红军占领太久，将地方民团的枪支搜尽了，以后想恢复就不容易了，曾编造各种理由向薛岳建议，应以全力即日收复遵义，并说他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但薛岳没有同意，说‘目前部队少了，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蒋介石的直属部队）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效。看来薛岳确有贻误军机之责。”

蒋介石对薛岳追堵红军不力也十分恼火，但又知道追查薛岳会使陈诚难堪，便掩饰道：“我曾经说过，川、黔、滇3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他们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我这一谋略的具体行动，也算是大功一件。其他方面就不要再作追究了。”

晏道刚、杨永泰知道蒋介石故作姿态以便稳住陈诚，也就缄口不语了。

陈诚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后，心中也就踏实多了，他立即向蒋介石献策道：“红军意在赤水渡江，我们就应组织强大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同时也应封锁横江，以防红军从这一带寻求渡江地点。并派兵渡过乌江尾追红军。这样前堵后追，长江即可变作第二个湘江了。”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接着又说：“薛修之言，也正是我心中所想的，大家也就在陈将军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研究。”

蒋介石一边背手踱着方步，一边听着大家的议论，认真思索着